

水运宪 虚构的乌龙山成为真实存在

水运宪自述
以情动人的叙述
是文学的最高境界

本报记者 何玉新

印象
将湘西的民间传奇
注入主流文化之中

上世纪80年代,湖南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《乌龙山剿匪记》轰动全国,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经典。近日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了水运宪的原著小说《乌龙山剿匪记》。对于很多没读过原著,并且对电视剧的记忆已经模糊的读者来说,无异于一次全新的体验。

《乌龙山剿匪记》

开篇一段叙述质感十足,读来如身临其境:“乌龙山脉横跨三省边界。莽莽苍苍,气势雄浑的崇山峻岭之中,流淌着一条小河。这条小河,千回百转,丝带一般缠绕着乌龙山的身躯。这便是乌龙河。乌龙河是山区与外界沟通的唯一交通要道。乌龙山里的老百姓,祖祖辈辈都靠这条乌龙河养育着。乌龙山区大大小小的土匪杆子,世世代代都在扼守着这条乌龙河,就像守着一个聚宝盆。河水的颜色十分奇特,蓝幽幽地透出一些暗红色。那种色调让人看得心里沉甸甸的,堵得慌……”

水运宪

祖籍湖北,生于湖南常德。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,专业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乌龙山剿匪记》《祸起萧墙》《天下归心》等。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电视剧金鹰奖等奖项。

这部小说重构了现实与历史的新关系,刻画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正反面人物形象,同时展示了湘西古老的传说、美丽的风景、淳朴的风俗,将民间传奇注入主流文化之中。这部作品也成为水运宪无法避开的人生标签,人们只要一见到他,就必然把他和《乌龙山剿匪记》联系起来。

年轻时,水运宪被招进常德电机厂当工人,改革开放初期又前往珠海、深圳闯荡,在商海里沉浮,感受社会的巨变。然而,无论在哪个位置,文学创作始终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,他说:“我喜欢到处跑,虽然没有读完上万卷书,好歹也行走过万里路,常常忽略了身边风景。但最后发现,文学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东西。”

以作品说话,以人品立身。对水运宪而言,文学创作是带有深切生命感受的人生体察,是对文学始终怀有敬畏之心的灵魂叙事,是聚焦人生终极意义的精神追问。他的人生也是一本书。



深入湘西大山采访七个月
写出《乌龙山剿匪记》

记者:创作《乌龙山剿匪记》的初衷是什么?

水运宪:1985年,我的老领导,时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台厅长梅幼先希望我写一部《湘西剿匪记》。他是部队转业的高级干部,湘西剿匪就是被他所在的部队彻底剿除的。他特别感慨那段悲壮辉煌的岁月,一直梦想为自己的部队树碑立传。我对湘西剿匪并不了解,但敬重这样的领导,于是便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,去了湘西大山。在当时,湘西剿匪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,采访很困难。湘西人不善言谈,有些事也不愿分享,为了获得他们的信任,我就先和他们喝苞谷烧酒交朋友。前后七个月的时间,我跋山涉水,走烂了好几双解放鞋,冒出血还差点把胃割掉,收集到很多创作素材,写下了大量笔记,对湘西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

记者:回去以后就开始写了吗?
水运宪:我先去了老领导家汇报心得。老人家为我泡茶时手有点发抖,似乎担心我会畏难而退。其实我已经被那个月的体验深深打动,从内心来撰,也希望借助这部作品表现自己更多的人生感悟。我告诉他,困难有,决心也有,我会写好这部作品,但最好改个书名,别叫“湘西剿匪记”行吗?老领导问为什么?我说,当年剿匪部队二十多岁的战士现在才五十多岁,当地土匪还活着的人也有不少,我不可能写得像,所以心里不踏实。老领导有点犹豫,问我改什么名字好。

记者:那是怎么确定叫《乌龙山剿匪记》的,当地有这座山吗?

水运宪:我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只茶叶罐,写着“冻顶乌龙”,受到启发,顺口说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地名,就叫《乌龙山剿匪记》吧!老领导喃喃自语念了几遍,回答说,这个名字上口,就这么定了!

这时候我才意识到,老领导其实更担心我在找理由不接受这项使命。随后我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剧本创作。

记者:《乌龙山剿匪记》播出后极为轰动,男女老少几乎无人不知,给您带来哪些影响?

水运宪:《乌龙山剿匪记》最终拍成18集电视连续剧,1987年播放。我拿到了一万元稿费,在改革开放初期,成为湖南省文艺界最早的“万元户”。那个时代搞文学的人还是很受优待的,我调离了原单位,成为专业作家。当时很多单位都有某个老职工被冠以“榜爷”的外号,名牌大学都有人把某个帅哥称为“钻山豹”,把某某妩媚的女生唤作“四丫头”。于我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大好事,却一度让我感到困惑。因为我还发表过很多部文学作品,平心而论,那些作品的文学质量都在《乌龙山剿匪记》之上,但是没有办法,我的其他作品都被“乌龙山”屏蔽掉了,成了作茧自缚。

“乌龙山”成为真正的地名
文学影视作品首度创造IP价值

记者:听说乌龙山后来成了真正的地名,当地人拿这个地名做足了文章。

水运宪:当年我要改个名字的初衷,只是想为自己争取一个相对广阔的创新空间。偶然得到“乌龙山”三个字,我还认真查阅了地理资料,未发现重名。殊不知没过多久,随着电视连续剧的反复热播,“乌龙山”这个莫须有的地名居然名扬天下。多少年后,湘西的父老乡亲都豪气地称自己是“乌龙山人”。湘西龙山县有道很长的峡谷,原名叫“皮渡河”,索性改成了“乌龙山大峡谷”。湘西的烟厂出品过乌龙山牌香烟,酒厂生产过乌龙山牌苞谷酒,有一家餐饮企业取名“乌龙山寨”,在省城开了连锁店,厅厅正中屏风上一幅《乌龙山剿匪记》浮雕,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我还听人说过,《乌龙山剿匪记》摄制组当年住在县武装部招待所,后来那个招待所改成了名字,叫“乌龙山宾馆”。申军谊住过的房间门口赫然挂着一块招牌,上面写着几个字——钻山豹旧居。

记者: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IP价值,您的一部文学作品让当地复制和创造了旅游资源,带来了品牌效应。

水运宪:有一次我陪外地亲戚去张家界天子山游览,导游妹指着路边一个小山洞说:“你们一定看过《乌龙山剿匪记》吧?那我告诉你,榜爷就是在这个山洞里被抓获的。”还有一次,我到湘西某县参加一个会议,会后县领导陪我们参观游览。穿过一个山洞出来时,导游小姐指着对面的悬崖说:“上头有几间木屋子,就是榜爷的故居。湘西剿匪之前,钻山豹、四丫头他们经常聚在那里开会。那里面摆放的全是实物,珍贵得很,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。”县领导知道我在场,不免有些尴尬,赶紧打断她说:“那只是作家创作的。”那位导游小姐却非常执着,还跟领导争辩:“领导您可能不知道吧?写《乌龙山剿匪记》的作家小时候也是从我们这里读书出去的。他们家的祖屋紧挨着榜爷的故居,三代以前跟榜爷家还有血缘关系呢。”同行的朋友们居然没有发笑,而是用一双双怀疑的眼睛紧紧盯着我。不夸张地说,当时我还真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。

记者:其实我觉得这恰恰是文学的伟大之处,比如贾宝玉、孙悟空,他们都是虚构的,但是在人们看来,他们比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过的人还

要真实。

水运宪:是的。文艺作品产生的后续效应往往也是作家本人始料未及的。《乌龙山剿匪记》起初给人的印象只是以假乱真,时间长了,以假乱真发展为真假成真,连我都有点百口莫辩了。虽然啼笑皆非,但内心深处时不时也颇感得意。

将现实中人性的光辉
转化为文学的真实画面

记者:在我印象中,《乌龙山剿匪记》这部作品最大的受益者是申军谊。

水运宪:最早剧组想让申军谊演正面人物东北虎,但他本人对钻山豹更感兴趣,就去找湖南台电视剧部的主任康健民,说不行的话他就不演东北虎了。康健民一看这个人吊儿郎当,什么都不在乎,觉得他可以演土匪。1988年,申军谊因出演这个角色获得了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,在影视界声名鹊起。到了2011年,他在浙江长城影视公司担任策划,提出翻拍《乌龙山剿匪记》的想法,获得公司的认可。他又多次与我联络、沟通,拿到了小说改编权。应该说,申军谊对这部戏是很有贡献的。

记者:《乌龙山剿匪记》是一部建立在真实采访基础上的小说,您如何理解文学作品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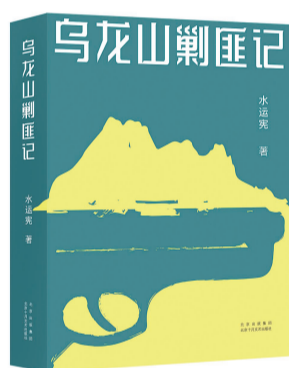
水运宪: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与想象。真实性并不可靠,所见所闻未必是一切真实的标准。真实性是科学层面的定义,真实感是文学层面的定义。功力不足的作家,把生活中的事情写得不伦不类,无法令人信服。但另一方面,将真实感无限扩大,也会造成读者的不信任。真实性在先,才能悟到真实感。文学不必搬搬生活,只表达对生活的感受。有的小说即使完全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,但深刻反映了真实生活,因而让人们产生了真实感。我觉得真实感必须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性,但它不是复制生活表象。生活真实性是文学的源头,艺术的真实感才是文学的生命。

记者:《乌龙山剿匪记》更接近于通俗文学,您怎么评价自己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?

水运宪:搞文学的人很容易迷失自己。文学的潮流时刻都在变化,很多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受影响的作品往往被贬损为大俗浅陋之作。大众化的作品似乎不如小众化的东西有品位,登不了大雅之堂。时至今日天地轮回,搞小众文化的先生们终于把自己也挤到了文化边缘,坐在冷板凳上开始反思。我得以从三十多年的迷雾中走了出来,再度审视《乌龙山剿匪记》这部大俗之作。无论如何,一部作品能够持续热播几十年,一个虚拟的地名能够这样被人熟知,一群塑造出来的人物多少年后还能让人耳熟能详,如数家珍,都做到这个地步了,孰轻孰重还重要吗?所以这一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这本书,我的心态很坦然,相信能获得更多新老读者的认可。

记者:您认为当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如何才能吸引读者和观众?

水运宪:我们总希望写得很有力量,很有思想,很有深度,但老是没有记住一件事,就是这个作品要读给谁、给观众看。我认为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故事写得更精彩,把人物写得更鲜活。一句话,把心交付读者,把情给予观众,怎么好看怎么写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,哪怕立意再好,没人看就没意义了。



人,这样的结构就是最好的。作品的最高境界是感动读者。巴老不善言谈,也不愿意指导别人如何写作,更不喜欢干涉他人的创作。恰好他这些朴实的语言,更能够影响到作者和读者。

我至今保存着许多与巴金先生的合影,还有很多他亲笔签名送给我的著作。他最真诚的一句名言“把心交给读者”,深刻地影响了我这一辈子。

巴金先生是一位文学巨匠,晚年出版的《随想录》是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。作为一位达到了炉火纯青、物我两忘境界的文学巨匠,巴老毕生都没有停止过自我完善。对我们这些后学而言,巴金先生如泰山北斗立于心中,直至永远。

讲述

从草原到天津,创办歌舞团二十九年坚守初心 文艺舞台上的一匹黑骏马

口述 赵国秀 撰文 陈茗

二十多年前,内蒙古舞蹈演员赵国秀在天津创办了黑骏马歌舞团,为天津、全国乃至海外观众奉献了一场场精彩演出,用豪迈的舞蹈传递着热情奔放的草原风情。不久前,赵国秀做客天津电视台文艺频道《最美文化人》栏目,讲述了自己充满艰辛又激情洋溢的舞蹈人生。

苦练蒙古舞加入乌兰牧骑
加盟天津友好使者艺术团

我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,最早跟舞蹈结缘并不是出于喜爱,而是因生活所迫。我从小家境贫寒,母亲是个自强不息的人,她希望我能上学,走出草原去看看世界。我初中毕业后差5分没能考上高中,正巧,乌兰牧骑到我们乡镇挑选演员。

第一支乌兰牧骑于1957年6月17日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成立。内蒙古地域辽阔,人口分散,交通不便,有不少牧区要走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。乌兰牧骑的蒙语原意为“红色的嫩芽”,引申为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。队员多是草原的农牧民,一专多能,报幕员也能唱歌,歌手也能拉马头琴,放下马头琴又能顶碗起

舞。无论是定居点还是放牧点,哪怕只有一个牧民,他们也会为这个牧民演出。

我不怎么会跳舞,考试结束后,负责挑演员的老师同意把我带走,但有一个条件,一年后如果能跳好,就进乌兰牧骑,不行就回家种地。我想给我母亲争气,一口答应下来。接下来那一年,我吃了不少苦。因为没钱交住宿费、伙食费,我就住在队部附近一间堆放炭块的库房里,自己带来黄米、土豆,自己做饭吃。尽管花两毛钱就能出去吃碗面条,可我真没钱啊。有一次感冒生病,队员们来看我,买了红糖饼干和方便面,那种滋味到现在我都记得。但生活的苦不算什么,我每天早晨5点准时起床练功,晚上也是练功练到最晚的那一个。

经过一年努力,我荣幸地被乌兰牧骑录用,激动之余,我也在心里认定,蒙古舞将是我一生的追求,我要把全部的情感和灵魂都融入到舞蹈之中。1991年,内蒙古全区乌兰牧骑汇演,我获得了舞蹈比赛一等奖。那是我第一次获奖。后来我的舞蹈、舞剧、歌剧又获得了几次大奖,我加入包头市歌舞团,又有机会来到天津,成为友好使者艺术团的一名演员。

天津人厚道,善良,尤其我们的老团长,在艺术和生活上都给了我特别



赵国秀(左二)与演员们

大的帮助。我和舞蹈演员刘忆英一起排练双人舞《查拉梦》,参加天津市舞蹈大赛,获得了一等奖。随后,我们又和华北五省的舞蹈比赛中再次夺冠。对我们两个人来说,这双人舞是缘分开始的。我用蒙古舞舞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,收获了爱情之果。我当上了天津女婿,在天津成家立业,天津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阅历的加深,我越来越感恩身边的人,感恩社会,想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社会。

成立黑骏马歌舞团
最难忘参演《穿越丝路》

我曾在乌兰牧骑受到老师们的谆谆教诲,在包头市歌舞团的四年时间让我开阔了眼界,天津则给了我更大

的舞台。舞蹈不仅是我事业的根,也是我生活的根,是我与天津结缘的根,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机会,想把这件事做得更好。2001年,我创办了黑骏马歌舞团,一不靠政府拨款,二不靠企业赞助,只为追求艺术的真、善、美,服务社会、服务观众。

我们招募来自边远地区的蒙古族、藏族、汉族、傣族的孩子,把他们带到天津,无偿培养、帮助他们。这些孩子没有专业的舞蹈基础,我想以最短的时间带他们走进艺术世界,教授他们舞蹈的同时,也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、感悟讲给他们听,让他们获得人生的经验。

黑骏马歌舞团水平有限,但我们对舞蹈的那种热爱是最真实的。团员们跳舞绝不会偷懒,在台前幕后都非常淳朴可爱。比如在后台更衣室,没有人喧哗,走之前会把水瓶、废纸等垃圾都带走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歌舞团特别温暖、特别亲切、特别敬业。我们学的是艺术的技巧、表现力,但最终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一种心灵的陶冶、一种精神的升华。

2010年6月,黑骏马歌舞团代表天津参加了上海世博会天津周的演艺活动,同年录制了央视《星光大道》节目。2016年1月,我们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。我们还多次参加全国及天津市的舞蹈赛事,获得全国及省、市、县各类奖项50多项。

最难忘的是2017年“一带一路”丝绸之路的演出。连续三个月,我们黑骏马歌舞团参演黎巴嫩卡拉卡舞剧院的大型歌舞剧《穿越丝路》,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丝绸之路、大漠驼影等唯美画面。《穿越丝路》的演员来自七八个国家,演出难度很

大。我们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障碍,然后是水土不服。我在这部剧中饰演了一个将军的角色,同时也要带着大家排练,做好后勤工作,保证大家的安全。

当时黎巴嫩大街上碉堡林立,演出时维和人员荷枪实弹在后台巡逻。正好赶上春节,大年初一当天,我去中国大使馆请柬,提出我们舞蹈团要为驻黎巴嫩的中国维和部队进行慰问演出。维和人员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。那次演出,我感到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。在国内,我们感受到的使命和担当只是小范围的,出国演出才发现这种使命感被放大了很多倍,达到了无我、忘我的状态。

我们黑骏马歌舞团现有团员50多人,平均年龄20岁。我们每年义务为天津的父老乡亲演出30余场,志愿服务乡镇文化巡演,走进军营慰问演出,到社区做艺术辅导、培训讲座,为福利院的孩子们送去快乐和祝福……在演出过程中,我们的水平不断提高,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最早参加歌舞团的那些孩子,有的已在天津成家立业,有的离开我们团后被专业歌舞团录用,在全国拿奖,成为优秀的舞蹈演员。看到他们取得了成绩,我心里比自己获奖还要高兴。

在蒙古舞中融入现代元素
发展才是对传统最好的继承

跳蒙古舞讲究大开大合,很容易受伤,但演员带着伤病跳舞却是一种常态。当年我在包头市歌舞团,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的一次大型演出,审查节目时不小心把脚崴了,脚面肿得老高。团长很着急,因为我这个角色别人没法代替。我安慰他:“我没事,您放心吧。”我拿绷带把脚面绑住,但还是不行,又打上封闭针,愣是带着伤完成了演出。因为

我觉得,我是个体,更是团队的一员,节目不能掉队,要克服自己的困难和伤痛,服从集体利益。

后来有一次我们去部队慰问演出,演出地点是一间大会议室,天花板上吊着几根灯管。当时我疏忽了,随着音乐声一跃而起,一个动作下去,不小心撞到灯管上,玻璃碴子碎了一地。音乐仍在继续,我也没想太多,该怎么跳还怎么跳,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做了很多动作。身上不少地方被碎玻璃划出了血,但因为我是穿的是红色蒙古袍,所以现场没人察觉,只有我自己知道那种疼痛。

蒙古舞传统的技巧和技艺已经非常成熟,身为舞者,不仅要继承这些传统,更要传承和发展。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,舞蹈的表现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。我想改变原先固有的方式,让观众既有身临其境的感觉,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通俗地说,就是要在艺术方面有所创新。我们歌舞团现在跳的虽然是传统的蒙古舞,但结合了现代舞的元素和表现方式,想要表现出那种从深情到激情的爆发,以及超越时空的境界。我想,发展才是对传统最好的继承。

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草原上的人家每天和放牧的牛羊相处,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,自然形成了热情豪放的性格。无论在城市里生活多少年,这些都是我永难忘却的基因。现在每次回草原,我仍然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洗礼,一种精神的享受。每当马头琴的音乐响起,我们都会进入一种全然忘我的状态,想用全部的情感去歌颂大草原。草原是我心中的根,舞蹈是我事业腾飞的双翼,心里的这颗爱心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发动机。我们带着蒙古舞走向世界舞台,也盼望我们的黑骏马能真正成为中国文艺界的一匹黑骏马。